

成都平原气候温和湿润、水系发达，这个适宜人类繁衍的区域孕育了中华文明中极其独特的古蜀文化。然而，曾延续两千余年的古蜀文明几乎被遗忘了近两千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缺乏文字记载的古蜀文明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国度或是充满浪漫神话的传说之地。直至 20 世纪初以巴蜀符号为代表的系列考古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我们才重新发现失落的古巴蜀文明，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史补上了极其重要的一页。

古人对古巴蜀文明的记录不多，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对后世影响较大，书中所载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论断亦被旧时文人奉为史实。这一延续了千余年的论断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巴蜀符号被发现才被打破。20 世纪初，成都白马寺附近出土了一批印刻有特殊符号的青铜器物，引起了研究者关注。这些符号重复出现在巴蜀青铜器上且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外形和一定的组合规则，然而它们既不同于青铜器纹饰，更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文字。卫聚贤最早对这些特殊符号进行了系统学术考察，并分别于 1941 年、1942 年两次在《说文月刊》上发表文章，对搜集到的 48 种巴蜀青铜纹符进行了考据和推测。他认为这些符号是用于表达特定意义而非装饰，明确提出此类符号应为“巴蜀文字”。卫聚贤开创了巴蜀符号研究先河，其成果亦成为此领域的首份汇编材料。



巴蜀符号器物（摄于成都博物馆）



巴蜀符号器物的符号特写（摄于成都博物馆）

此后，学界开始关注四川、重庆及周边地区出土青铜器物上的此类图符，并称之为“巴蜀符号”或“巴蜀图语”，搜集整理到的对象逐渐扩展到约 300 个（种）。就截至目前的发现而言，战国早期至东汉时期的器物上都有巴蜀符号；它们广泛分布于青铜兵器、乐器、玺印及少量生活器物之上。当今主流学界基本赞同卫氏的看法。李学勤将对巴蜀文字的解读列为“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十个课题”，并在《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中明确指出：“我国先秦的文字，除汉字外可确定的只有巴蜀文字，有关材料积累不少，如能解读，必将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有较大帮助。”

巴蜀文字的发现，不仅打破了古蜀“不晓文字”的论断，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发现成为我们重估古蜀文明与再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契机。卫聚贤正是在有关巴蜀文字发现的文章中提出了今日著名的“巴蜀文化”概念。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动摇了当时学界传统的“中原中心论”观点，拓展了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理论进路。古史辨派大家顾颉刚亦几乎在同一时期提出春秋之前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开创了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研究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若干重大考古发现再次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做出佐证。从 4500 年前的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春秋战国时期灿烂的古蜀青铜文化……随着对成都平原各文化遗址的深入探索，古蜀别具一格却又与中原文化紧密联系的两千余年文化发展谱系浮出水面。可能没人会想到，在西南一隅偶然发现的几个刻画符号，会成为学界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重要契机。（下转封三）

(上接封二) 对巴蜀符号性质的讨论,亦对建立中国学术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近几十年来,研究者普遍认可巴蜀符号是一类表达特殊意义的符号,但对它多大程度上属于“(成熟)文字”却看法不一。这种争论的核心,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文字”认识的不同。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文字观念,承袭自“语音中心”主义语言学,视文字为语言(语音)的载体,因此认为只有覆盖语言总体、表音的文字才是高效率的、成熟的文字。这种以西方拼音文字为尊的“符号达尔文”近年来开始为我国学界认识并展开反思。胡易容认为,巴蜀符号的单个符号特征恰好使得它可能保留较为明晰的图像理据特征,这种介于图符与成熟象形文字之间的符号体系是对探索中国学术理论体系的重要补充。

近年来,四川大学“巴蜀图语的符号谱系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课题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巴蜀符号的研究做出了极大扩展。团队在继承四川大学自徐中舒先生以来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的深厚积淀的基础上,将现代认知生物学和传播符号学理论与巴蜀符号进行了有机结合。人文传统与前沿科学方法的跨界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古文字研究的视域。从前,巴蜀符号的讨论多基于研究者的“猜想”,往往各说各话;而在脑电、脑核磁等实验设备的辅助下,研究者可以从大脑反应、激活脑区差异的实证角度对巴蜀文字的性质和表意机制做出探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越过“解读”的困难,将巴蜀符号与人类史上多种早期文字进行比较和对话。目前,研究团队已建成学界首个巴蜀符号数字材料库和国内一流文字认知实验室,在认知科学前沿与古文字研究结合的道路上迈出坚实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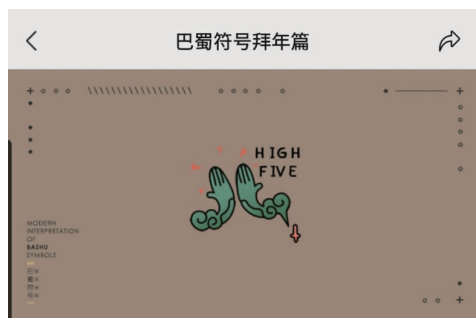
巴蜀符号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文字考古研究,其活力更已在传播实践中迸发。今日语境下的“巴蜀文化”被赋予了广阔的内涵,它不仅包含狭义的古巴、蜀文化遗产,更是指以川、渝两地为核心的多民族文化在融合发展过程中从古至今的文化总和。而“巴蜀符号”,在今日传播实践中也包纳了川渝两地悠久历史中的种种文化符号:从神秘的三星堆青铜面具到憨态可掬的熊猫形象等。今天我们对古文字的研究或面临一次重要转向。对古文字的考据当然极其重要,但我们也应认识到,哪怕被完美解读出的古文字依旧不会是“鲜活的”,因为它们早已失去了其表意的环境——符号活力唯一的来源是人们的表意活动。在这方面,研究者的视域往往落后于社会发展。我们发现,学术上难以解读的“死文字”早已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被重赋强大的表意活力。比如,将巴蜀符号制作为表情包的符号新解,将巴蜀符号作为巴蜀文化标志进行创意设计,以巴蜀符号为创意的文学创作,等等。人们并不需要去考据巴蜀符号的“原始理据”,也能自发地赋予其新的使用情景和意义。

狭义的巴蜀符号表征了巴蜀深厚文化的历史一维,它以新的面貌与新兴的“现代符号”一同酿出了川渝双城文化圈的独特韵味。如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圈”的建设。当下广义的巴蜀符号的传播实践过程,也正是这一区域当代文化面貌的构建过程,所彰显的是城市独特的文化形象和精神力量。

将传播实践研究引入对巴蜀符号的讨论正是对当下文化发展的回应,更是理解巴蜀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文符的具体意涵有所改变,但它们在“变”中维持了其本质功能的“不变”:从前,它们是巴、蜀族人的文化标识,在今日文化下,它们成为川渝文化圈居于中华文明共同体发展中、将现代与传统相连接的重要线索。

(作者简介:胡易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杨登翔,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巴蜀符号拜年篇 动画

添加

在川渝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上,常见一些图形符号,它们不同于其他纹饰或任何已知古文字,学界多称之为“巴蜀符号”。这套表情包以几个巴蜀符号为主体进行了拜年相关的再创作。



巴蜀符号文创设计(四川大学巴蜀符号课题组)